

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编

山西

文史精选

阎锡山其人其事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 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 编

山西文史精选

阎锡山其人其事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目 录

阎锡山“二的哲学”的运用.....	戒子和 (1)
阎锡山《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研讨经过.....	杜任之 (6)
侯外庐谈阎锡山.....	(32)
刘岱峰谈“七·七”前后的阎锡山.....	(40)
我所知道的阎锡山.....	田象奎 (46)
对阎锡山的剖析.....	李冠洋 (59)
一些人士对阎锡山的看法.....	阎效正 (102)
赵戴文和杨爱源谈阎锡山.....	陈光宇 朱崇廉 (106)
阎锡山使用干部的手腕.....	王尊光 (108)
我在抗战前对阎工作的一段经历.....	张友渔 (113)
西安事变前后的阎锡山.....	周 珩 (116)
阎锡山在西安事变中的活动.....	郭汾阳 (119)
附：阎锡山与西安事变的几则电文.....	(130)
十二月事变后的阎锡山.....	杨怀丰 (132)
我和阎锡山接触过的一些往事.....	温震东 (137)
阎锡山历次传见的回忆.....	翟品三 (156)
同阎锡山接触所见.....	杜彦兴 (174)
和阎锡山打过的几次交道.....	李兴杰 (180)
我所见到的阎锡山.....	张正廷 (188)
阎锡山五龙宫避战记.....	杨怀丰 (192)
记阎锡山二三事.....	宁梦喜 (197)
关于阎锡山的琐事回忆.....	翟品三 (199)

阎幕琐记.....	李慕源(210)
在阎锡山身边工作的见闻.....	徐崇寿(237)
侍阎见闻杂录.....	祝秉钧(256)
阎锡山讲收获哲学与上党地区.....	张荣汎(258)
回忆阎锡山的几次讲话.....	杨锡九(260)
回忆阎锡山的几次谈话.....	牛青庵(265)
在上海和阎锡山的一次谈话.....	武和轩(268)
阎锡山的自杀准备.....	杨镇西(270)
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前后.....	贾文波(271)
阎锡山在广州.....	夏 风(280)
阎锡山离晋去台始末.....	李慕源(303)

阎锡山“二的哲学”的运用

○ 戎子和

阎锡山的“二的哲学”、“唯中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他为人处事就立足于这些哲学思想上。这些哲学思想都是为他统治山西服务的。他平时处理大事不走极端，不一边倒，而是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对自己有利的就干，没利的就躲开；或在几种势力矛盾之中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他在西安事变时本来应张学良之请让赵戴文到西安进行协商，当赵戴文的专机就要起飞时，阎锡山接到了南京政府何应钦声讨张学良、杨虎城的通电，便突然改变主意，立即打电话把赵戴文叫了回来，并发了不赞成张学良、杨虎城的电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他的哲学思想在政治上表现最突出的是“联共反共”、“亲蒋防蒋”、“抗日和日”策略的运用。他在这三种力量之间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一方，也就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正如他常说的“冬天穿皮袄，夏天穿布衫”。谁的力量妨碍、动摇他在山西和绥远的地位他就反对谁。如1936年红军东征，他要求蒋支援，可红军回师陕西后，蒋军赖在山西不走时他又要防蒋。他常对人说：“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他对日军原抱着你不侵犯我，我也就不抗日的幻想。后来日军进攻绥东，侵占了他的地盘，他即接受共产党提出的抗日宣言，起来抗日，但口号是“守土抗战”。他对日、蒋、共三种势力都采取了既防又联的态

度，并利用三者之间的矛盾来求得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阎锡山还是个能伸能缩的人物，当环境对他不利时，他很有一套韬晦之计，卑躬礼让，待机而动。如袁世凯称帝时，他看到袁的势力大，就背叛了同盟会和孙中山，给袁写效忠信，发电称臣。袁指派金永任山西巡按使（即今省长），并重用黄国梁时，他看出这是袁不信任他，于是他表面上对金和黄特别尊重，降格屈从，经常请金、黄两人一块吃饭，特别对黄表示亲近，几乎每餐都在一起吃，如果黄有时来迟，他就等着不开饭。黄作风骄纵，他也听之任之，一旦袁世凯不行了，他就毫不手软地把金赶跑，把黄挤掉，一人独霸三晋。

阎锡山对人的使用 and 态度也完全本着“需要就是合法”的原则。“九·一八”事变那年，山西的学生集队向国民党省党部请愿，省党部指令它的武装击毙了一名学生穆光政，阎就利用山西学生反对国民党，把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势力赶出了山西。

1936年下半年，当他打算抗日时，需要我们年轻人为他工作。10月，牺盟会在太原海子边开群众大会做宣传工作，会上我发表了讲演，因其中两句话触到阎的禁忌，一句是“打到鸭绿江边收复失地”，一句是“坚决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会后，日蒋两方质问他，他害怕了，就骂我给他捅了漏子，限我半年之内不准向群众讲话。1937年10月初，我带领决死三纵队从太原南下，要了两节车皮，沿途常因援军北上、伤兵南下而让路，走走停停。而阎的秘书长贾景德这时却要了几节车皮运他自己的家私、瓷器等物，沿路畅通无阻。在太谷站我把他的车皮扣下，给伤兵南运让路。贾到阎那里告我，阎没有理他，实是有意借我的行动打击贾的邪气。还有一次，也是在1937年冬天，运城牺盟中心区负责人王竞成（女）告诉我运城专区专员关芷萍及安邑县长白××很反动，国民党在运城潜伏下来的反动分子力量还很大，要求我去帮助他们开展工作。于是我就带了一个连去帮助王组织了一

次两三千人的游行示威，提出要斗争国民党残留下的张某等和安邑县县长白××几个人，这些人一听到消息都吓跑了。后来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阎，也被阎压了下来。因为当时反对国民党人正合他意，不算罪过。他用人总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只要对他的“存在”有利，就用你，其他什么恩怨，都可以不计较。他要用你，就注意拉拢你，亲近你。有时开会晚了，他还要留你在他家吃饭，而且表现得极其“诚恳”、“亲切”。记得有几个小军阀见过阎后，出来对人说：“阎真有本事，人一见他就被化了。”阎锡山还常对人讲：“人都是要多占的，别人是一丈长的板凳要独坐或坐九尺，我不，我只坐六尺。”意即要给别人留有余地。由此可以看出，阎是个很有权术而又狡猾的政治人物，是一个要多占而又好象“知止”的人物。

他用人不用尖子，他说尖子人才不易驾驭，不易服从命令听指挥；但也不用奴才，他认为奴才办不了事。他告诉人们，他在日本留学时，功课考试不前不后，太靠前了，怕日人警觉害他；太靠后了，名声不好。他为让手下人互相制约，利用十三个高干之间的相互矛盾，由他来一统。他还在自己的武官和文官之间制造矛盾。如他用了较开明的李冠洋，便同时又用了一个顽固的邱仰濬；他支持我搞北学联，又让李畅生搞了个南学联。用武官，在一个部队里也要用两个互不和睦的。如任命一个军长，就要给这个军派一个和军长不亲近的师长；任命一个师长，又必要委派一个和师长不亲近的旅长和团长。省政府各厅长也要用互相有矛盾的，如樊象离和邱仰濬之间有矛盾，他任邱仰濬为民政厅长，就同时任命樊象离为建设厅长。在山西新军中，他也使用了这一套方法。如用一个新派当政治委员，就用一个旧军官当纵队长。他让这些互相有矛盾或和自己有亲疏之分的人配备到一块，互相牵制，他从中掌握运用。

阎锡山还是个非常重视军队、保存实力的人，在这方面也充

分运用了他的“二的”哲学。他常说：“无力之理不伸，无理之力必折。”也就是说，只有道理而没有武装还是不能存在。阎锡山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当了清朝标统，辛亥革命又当了都督，而后任督军、督办和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反蒋战争时任陆海军总司令；从大连回来又任太原绥靖主任，抗日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这说明阎很懂得保存实力的道理。他今天和这个人联合，明天又和那个人结盟。如第二次直奉战争，曹锟、吴佩孚失败，段祺瑞上台，他就出兵石家庄，阻鄂豫援吴军北上，不久又联合张作霖、吴佩孚攻击冯玉祥，这些事例不胜枚举。他一生和中国军阀订了金兰谱的不知有多少，目的都是为保存自己的实力和地盘。1931年8月，他从大连悄悄回晋后，照旧当着山西的土皇帝，蒋介石竟奈何他不得，原因就是保存了实力，而冯玉祥将军却一败不起。

抗日初期，阎锡山的军队大部分和日军一交锋就败下阵来，从此他便想建立一支新军。当他接受了中共的统一战线方针和建立新军的建议后，就重用牺盟会干部大力建立、发展新军，学习八路军战略战术，俨然是一位旧军队的改革家。他周围的亲信反对牺盟会时，他私下里又给他们解释“冬天穿皮袄，夏天穿布衫”的道理。1925年以前，他为了控制住军队，在任用营长以上（还有说是任连长以上的）官职时，都要亲自谈话，施以小恩小惠，予以溶化，以便让军官为他效忠。他还建立了一支特殊的情报技术队伍，他的干将梁汝舟为他创造了一种破译密电码的技术（只是没能破共产党、八路军的电码），所以他能及时了解中国军阀之间和部下之间的情况，作为他处理问题掌握主动权的奥妙。如阎原部下商震为蒋介石拉走，蒋给了商一个军的活动经费，商用这笔钱，在日本订购了一批军火，阎及时得到了情报，就将军火扣留，把商调回山西当空头省主席了。中国共产党和阎锡山搞统一战线推动他抗日进步，从而中共和人民的力量得到了发展和壮

大，而阎锡山在这两年中也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得益不浅。第二战区一度成了模范战区，阎感到脸上很光彩、很得意。

阎锡山在“存在就是真理”的思想指导下，很懂得经济建设的重要性，他选用技术人才，在山西建设起相当大的工业体系，凡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厂子，他几乎都有，如兵工、钢铁、煤炭、水泥、化工、电力、车辆制造、棉纺、毛纺、纸烟、制盐等30多个工矿企业。由于军事工业的发展，晋绥军的武器能做到自给而有余，因此，阎还是华北、西北各军阀军火的主要供应者。他大作军火生意，赚了很多钱。他曾严禁过鸦片毒品，后来发觉因禁毒使山西银元大量流出，就反过来利用鸦片公卖赚钱得利，美其名曰售“戒烟药饼”。这种药饼直到抗战初期还没有卖完。因此山西有人讽刺他的“守土抗战”是“守住大烟土抗战”。他还很会做买卖（投机倒把）。1930年底他下野，一到天津就做起买卖。他常要人们算个帐，用一元钱贷放，月息一分半，利滚利，20年后共有多少钱？他在经济上有了基础，就不怕蒋介石卡他的脖子了。所以他不象其他军阀没有地盘、没有经济来源，很容易被蒋介石各个击破。他还意识到只有老百姓生活安定了，生产才能发展，才能供他长期剥削。所以他是不轻易参加军阀混战的，常以“保境安民”作号召。

我于1932年3月结识了阎的部下李冠洋，随后参加了李组织的“中国青年救国团”，后来任青干委员。但真正和阎锡山见面是在1933年下半年以后。我当时是山西北学联的代表，大概一年能和他接触三四次。李冠洋把“青年救国团”分为国级（总团级）、省级、青干委员三个等级，阎在那个时期对这个组织还相当重视，有时把三级干部召集起来一块开会，有时分别召集。一直到1936年夏组织自强救国同志会，9月成立牺盟会，以至1939年的秋林会议，我都和他有过不少的接触。

（张冰、王秀明访问整理）

阎锡山《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 研讨经过

○ 杜任之

1933年3月中旬，我从欧洲回到上海。由宋庆龄领导的反帝“国主义同盟总部，安排我回山西工作。1934年初，上海反帝同盟派向君实来太原，要我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太原通讯员，主要任务是搜集阎锡山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此间，阎锡山正在搞他的“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的“学说”。研讨其产生过程，将有助于认清它的实质。

初见阎锡山

我到山西后，由太原绥署交际课课长薛重熙接待。他说：山西留学生返晋，“老总”（阎锡山）一般照例安排先做秘书、参事，以后再根据情况调任其它职务。由于这个职务能接近地方实力派，了解阎锡山集团的政治情况，我便答应在绥署当秘书。

我又去找薛重熙时，他说：“你就在这儿干吧！阎主任到河边故里去了，短时间回不来，最近安排你到河边去见见他。”我说：“那就这样吧！”10月18日，我正在正大饭店休息，接到绥署的电话，要我搭西北实业公司的车，到五台县河边村去见阎锡山。

阎锡山的老家在河边村的永和堡（亦称文昌堡）。在永和堡北面有一座宫殿式的典雅建筑，叫做东花园。花园内的中国式庭

院有自来水和暖气设备，这种中西合璧的居住条件，当时在北方是不多的。

阎锡山正在办公。传令兵说办完事、吃完饭，便可召见。一个小时后，我见到了他。他个子不高，但很精神，敦实健康。在两道粗粗的眉毛下，一双鹰隼一样的亮眼，闪动极快，看来他很有主见，善于周旋应付，表面上看也很诚恳。他很会笼络人，对我没摆架子，问寒问暖，然后微微一笑，问道：“你在德国学的是甚？”

我说：“我学的是采矿冶金。”

“好，山西正搞建设，正用得上哩！”他说。

“以后我得了肺病，学校让我改科，后来又学了经济。”

“那也有用。”他眼珠一转又说：“你说说希特勒是咋上台的吧！”

我略谈了一下希特勒上台的经过，然后大骂希特勒的法西斯党，说他如何准备战争，准备侵略其它国家，如何在国内维持他的血腥统治。我一边起劲地讲着，一边观察阎锡山，见他越来越不耐烦。我讲话，他就看桌子上的公文，我见他面有不悦之色，便转了话题说：“我在德国就听说主任在搞一个十年建设计划，因此，我就对苏联的五年计划特别留意，作了一些研究。”他眼光一闪，抬起头说：“那很好哇，你就先到主任办公室去吧，现在山西正在用人，以后你有什么有关建设的资料，留点心，看着点，向我汇报。你今天就跟他们一起回太原吧。我不久也就回去！”

阎锡山返回太原后，我收到任命我为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委任状。11月发薪，每月100元，相当于中校军衔的薪金。薛重熙带我到主任办公室见了诸同事。当时秘书中有“四小金刚”：张金，负责起草电文，修改文件；裴琛，负责剪报，把要闻说给阎锡山；朱点，专管同蒲铁路工程；方闻，随从秘书。这“四小金刚”每日随阎办公，其他秘书大部分是东洋、西洋留学生，事不多，算

作阎锡山的“智囊团”。如高叔康，严开元，从学校下来的中学校长萧静庵，被国师学生驱赶出来的教员薄毓相（字右丞），以及参加过五四运动曾与胡适通讯的常燕生等等。这些人，每日无事可作，阎锡山偶尔批下一两件外来信件、外国资料，叫他们看看，再签个意见呈阅，算是一种咨询。这些要办的事，也多不涉及决策问题。我才到，比他们更清闲，根本就无事可做。阎锡山在其公馆办公，又很少来办公室。因此，我每周只去一两次，看看有无“公事”要办；一旦去了，便找赵戴文，设法接近他，跟他聊哲学问题。赵戴文比较好学，通古籍，一来二去，我就和他比较熟了。

我初到山西政界，感到这里死气沉沉，思想不够活跃，便想办法作青年学生的工作，在青年学生中进行抗日宣传，积极扩大影响。不久，国民师范来请我给学生们作报告，我用了两个半天，作了题为《德国希特勒的上台与反法西斯问题》的报告；回到我的母校山西省立一中，作了《青年的生活与学习》的讲演。为了支持“五月剧社”公演话剧，我作了《提倡话剧》的演说。然后，便到山西大学文学院兼课，教德语、哲学、逻辑学；到山西法政学院教“社会政策”。同时在家中和学校，还接待了不少青年的来访，给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

与阎锡山辩论

“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此时，阎锡山的政治思想体系正处于形成阶段，为使自己的“学说”完善化，他便请人与他辩论。我想，要接近阎锡山，一定得利用这个机会。然而，他常住五台县河边村，我又没有什么要紧的“公事”去办，因此很难见到阎锡山。怎么办？我打听到阎锡山的工作情况：除同蒲铁路和太原炼钢厂的建设问题他要亲自过问外，其余军务由参谋长朱绶光、秘书长贾景德，政务由省府秘书长王谦（王尊

光)，财务由财政整理处处长邱仰濬等要员分工办理。其时，他在河边与秘书方闻和薄右丞修改他的“学说”《阎伯川先生新村建设讲话》，也就是后来付印成册的《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我便请剪报秘书裴琛给在河边村的方闻挂了个电话说：“杜秘书看了总司令的《新村建设讲话》以后，有很多问题要问。他是留德学生，专门学过经济学、社会学，他愿意到河边村去参加研究工作。”

我的要求得到了同意。

第二天，我带了德文版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及几本社会主义学说史，搭别人的车子到了河边，住在招待所内。阎锡山见到我时说：“我先办点公事，你等一等。”他办完事，然后对我说：“欢迎你来，在河边多住几天吧，咱们明天再谈。”

寥寥数语，表明他对我的态度已经有了变化。首次见面时那种厌烦的表情不见了。看来，他现在用得着我。

我事先从方闻那里了解到，阎锡山正苦于他的“理论”，“学说”没有“深度”，显得“浅薄”，反过来，调过去，就是那么几句话，纵向不成系统，横向展不开，没有个“学说”的气派，正需要有人给他提出各种问题，指出其破绽，与他辩论，好在答辩中“丰富”他的“理论”，使其“学说”条理化、系统化。

第二天，我去见阎锡山。客气几句之后，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变与不变的问题。他说：“我的按劳分配，公平合理，永久不变。”我认为这不可能。提出：世上的事物都在不断地变化，没有不变的东西。阎锡山听后脸上微红，觉得有点为难，他眼珠转了几下说，“一切都变，也有不变的。那就是‘子理变，母理不变’。比如敬为母理，古今中外都有敬，但敬的表现方法古今中外就有不同；再比如，孝为母理，古今中外，儿女对父母

都要孝，但孝的方法，中外古今不同……”

这是很容易驳倒的。但是我没有摸清他的底蕴，只是淡淡地说：“原始社会生产力很低，无食无衣，就有对其老人故意处死的，那时就没有所谓孝。”

阎锡山眼珠一转说：“哈，如果确有其事，那也是孝。因为老人活得很难，死了好，老人也少受罪，这不是孝吗？”

我没有与他纠缠“孝”的问题。他显然认为说服了我，得到了胜利。我说：“要是按照科学道理来说，总司令的话很难自圆其说。总司令的‘按劳分配’，马克思早就说过了。但他还说，社会制度总在变化着，没有什么永久的不变的东西。马克思说资本主义要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阶段要实现‘按劳分配’，发展到共产主义，就变成‘按需分配’了。”

阎锡山一听觉得不好回答，考虑了一下说：“我主张的‘按劳分配’是劳动与享有的一致，合乎人情，合乎道理。所以永久不变。”这简直是答非所问，论证与论点脱节。他又说：“人是有欲性的，有理性的。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违反人性，不合道理，所以不能实行。苏联实行共产主义失败，改行新经济政策就是证明。”

我没有直接反驳他，我说：“据说，新经济政策是苏联过渡时期的政策：先通过新经济政策，恢复与发展生产，实行农业集体化与国家的工业化，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这个阶段要实行‘按劳分配’。随着生产的高度发展，文化的高度发达，就要变成共产主义制度，那时才实行‘按劳分配’。”

阎锡山说：“你这是马克思的说法。听说马克思讲什么辩证法，所以认为一切皆变。”

“一切皆变，这个命题，古代希腊哲学就已经有了。古代中国的《易经》，也这样讲。”我进一步说：“讲一切都变，这不新鲜。马克思不仅说一切都变，还指出了变化的法则。”

阎锡山问我：“变化有什么法则？”

“总司令要问，我就说一说。这就是恩格斯所概括的三大法则。”接着我大体上讲了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法则。

阎锡山说：“外！这就是马克思制定的法则吗？”

我说：“这是客观存在的变化的法则。马克思以前，事物就按这法则变化着，只是马克思发现了这些法则，所以叫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阎锡山说：“不加‘唯物’二字还好。”

我说：“不加上‘唯物’二字，就返回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了。马克思正是从物出发，发现客观存在的法则的。把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颠倒过来，放在物质的基础上，才称为唯物辩证法的。”

“黑格尔与马克思，一个唯心，一个唯物。各执一词，各有所偏。蒙（我）主张心物不可偏废，执两用中。”

这时，侍从副官进来说：“报告总司令，开饭吧！”我一看表，已谈了一个上午。阎锡山站起来说：“过一两天再讨论。你对我的讲话再提一些相反的意见吧！经过辩驳才能立得住。”

阎锡山要治两种“病”

第二天，第三天，阎锡山有事，不能谈。我便利用这个空隙，与阎锡山的本家亲戚聊天，摸了摸阎锡山的家庭情况和他的历史，一一记在心里。过了两天，阎锡山有了空闲时间，大概与他的秘书们做了一些准备，又一次叫我去，进一步讨论其“学说”。这一次，谈话方式有了变化，由他先讲。

他摆自己的观点说：“资本主义国家为甚发生经济恐慌？为甚停止生产，销毁产品，工人失业？……这全是金本位货币——‘金代值’造成的。”

我说：“这要讲出道理才能服人。”

他说：“资本主义的百物生产得多，金子生产得少，金子代表的百物产品的价值受到限制，产品存在工厂内不能流通，就停止了生产，发生了经济恐慌。如果废除‘金代值’，实行‘物产证券’：即有一物品，发一证券；有多少物品，发多少证券；对工厂存的产品用证券收购，放在仓库里，工厂就不会停止生产，工人就不会失业。”

我便道：“总司令，科学可不能想象。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关系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才发生经济危机，而且一次比一次规模大，加上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化，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崩溃和灭亡。”

阎锡山说：“实行‘物产证券’就能防止社会崩溃。实行‘物产证券’，工厂不停生产，还可以扩大生产，工人就不会失业。工人有工作，能生活下去，就不会起来革命。”

“工人受剥削，陷于贫困。”我说：“你仓库里存着产品，他无力购买。他没有那么些‘证券’，去购买你的‘物产’。他们还是要革命的。”

阎锡山眼珠一转说：“剥削是‘资私有’造成的，资本私有，就不能实行‘按劳分配’。这是‘分配病’。治疗这种病的药方是实行‘资公有’。经济恐慌，工人失业，是‘金代值’限制生产造成的，这叫‘交易病’。治这种病的药方是实行‘物产证券’。”

我问：“治综合性病症，能分开治吗？”

“怎的不能？资与产要分开，交易与分配各是各。我的‘学说’归结为一句话：‘资公有’，‘产私有’，‘按劳分配’；废除‘金代值’，实行‘物产证券’。只要这样办，就可以解决整个社会问题。”

“总司令给资本主义社会治病，要分开治。可是资本主义的

生产是社会化的。恐怕无法把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分开吧。”由于我不便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本质，向他讲得太清楚了，太明确了。他听不懂，就有点不耐烦起来。于是我就改了话题，结束了第二次讨论。后来，听方闻与薄右丞讲，阎锡山对马克思的理论十分头痛，觉得“吃不倒”马克思的理论。他想东偷一点，西窃一点，凑成自己的“学说”，他的这种实用主义态度，注定他的“学说”是支离破碎而又互相矛盾的。

分 与 不 分

不久，又进行了第三次讨论。这时，我提出应该筛选、集中一些问题，先把“按劳分配”暂时搁下，集中考虑“物产证券”问题。因为照阎锡山的说法，实行“按劳分配”，要“资公有”，生产资料公有如何实现？谈何容易！恐怕不是一个军人地方政权所能办到的。我便说：“这些可以暂且不谈，关于‘物产证券’作为一种货币学说，也还需要理论根据和实践证明，只谈以什么为货币本位，恐怕未能触及事物的实质。”

阎锡山说：“那就先讨论‘物产证券’吧，这对于解决世界经济恐慌，大有帮助。”他象有什么重大发现似的，仿佛这“学说”可以医治资本主义的痼疾。

“劳动创造价值，价值与价格，生产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关系等系列问题，都要说得通才行。科学要完整，不好凭脑子猜断。请你讲讲对价格的看法吧！”我不便直接反驳他，只让他摆一摆自己的观点。

这一下子，他有话说了。他承认劳动创造价值，但有些问题他并不懂，不懂，却还要充圣人。他硬说产品变成商品后，可以不必分什么生产价格与市场价格。

我说：“要把资本主义分解开，治它的病。但是现在别人分